

# 冷战与传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闻处 对华宣传中的目标人群与媒介运用

翟 韬

**【摘要】**在冷战前期中美对抗的时代,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了宣传攻势。这种攻势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中国大陆居民,运用中文媒介“对华宣传”;另一种是运用外文媒介在国际舆论中开展“涉华宣传”。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运用的主要媒介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是外国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主要媒介是新闻和出版物。大体上,美国对华和涉华宣传针对的受众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宣传媒介的选择相应地也是“智识活动”和“知识体验”式活动(广播读书会、时政新闻和书刊、社会纪实小说等),内容多围绕深度时政新闻话题展开。这是美方针对第三世界社会精英一种惯常的宣传技巧,体现了冷战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关联性。

**【关键词】**香港美国新闻处;宣传;美国之音;报导中国项目

**【作者简介】**翟韬,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社会科学史(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23.6.59~71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外交与战后美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全球建构研究”(20&ZD243)的阶段性成果。

冷战前期,美国针对中国的宣传分为两种,其一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为宣传目标的“对华宣传”(propaganda towards China),其二是在世界媒体中关于新中国话题的“涉华宣传”(propaganda about China)。美国不仅高度重视针对新中国居民的宣传渗透,而且试图塑造世界范围的涉华舆论环境。美国政府的对华宣传针对新中国居民,使用中文,涉华宣传针对中国以外的国际舆论,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运用外文;对华宣传主题主要是“诉说中美友谊”及一些反共话题,涉华宣传则主要是在第三世界舆论界诋毁中国是“帝国主义”且不代表“未来潮流”;对华宣传的政策目标是直接影响新中国舆论生态和中国政治,涉华宣传的政策目标则是塑造中国以外的国际舆论,改变中国身处的舆论和国际政治环境。

以上这种区别,笔者曾做过相应论述。<sup>①</sup>

本篇是对既往研究的深化——对于宣传媒介和相关目标人群的研究。笔者将考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美酝酿缓和及尼克松任期之前,美国如何运用以广播为主的中文媒介展开对华宣传,运用以新闻与出版物为主的外文媒介在世界舆论中传播与中国有关的话题。媒介的选择和对目标人群的设计是分不开的,即需要选择合适的媒介针对相应的人群,因而笔者也将考察美国对华宣传目标人群的选择和设计意图。本研究聚焦对华涉华宣传最重要的“基层”机构——香港美国新闻处,了解其如何运用媒介,以窥见美国全球传播“权力末梢”的运作方式。

整体而言,关于美国对华宣传的媒介研究多集

中在广播(美国之音)媒介上,尚有较大拓展空间。直接与本研究相关的几篇文献<sup>②</sup>虽然涉及相关媒介,但没有全面、系统研究美国对华涉华宣传三种主要媒介(广播、新闻、书刊)的完整情况,没有深入探讨宣传媒介如何与美国对华涉华宣传政策目标相配合,也没有专门分析媒介和受众的关系及背后的宣传策略。本文旨在对美国对华涉华宣传传媒的整体运用情况做出系统考察,以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 一、美国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和汉语广播的运用

1949–1953年,美国对新中国展开了宣传攻势。美方针对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受教育阶层和党员干部,使用的宣传媒介主要是美国之音广播及邮寄印刷品。

### (一)宣传机构和目标人群

二战后美国政府增加了在华的宣传站点,凡有美国驻华领馆处皆下设新闻处。1945–1949年期间美国在华一共设有11个站点和1个总部(上海)。美国驻华新闻处“从沈阳到昆明、从上海到迪化向四亿中国人讲述美国故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到1949年11月,美国驻华新闻处全部从中国大陆撤走。<sup>③</sup>之后经过一些调整,至1950年6月,在华美新处只剩下香港和台北两处。<sup>④</sup>其中“香港美国新闻处”实际上就是原美国驻华新闻处驻华总部的继承者,其主要职能是“离岸”对整个中国大陆进行宣传。台北美新处主要负责美国对台和涉台宣传,由美方操作的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宣传并不多。因此,香港美新处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对华宣传执行机构,是事实上的对华宣传总部。香港这座城市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宣传攻势中拥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按照美新处1950年初的总结,香港具备三个优势:与中国内地距离近、有良好的交通和传媒设施,以及相当可观的华人口,其中包括一些“政治异见领袖”,因而美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在香港建立对华宣传和秘密行动的基地。<sup>⑤</sup>

对于目标人群,美方最重视的是两个群体,一个是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是党员干部。

知识分子群体首先是“受过教育的阶层”(educated class)。按照美方档案中的描述,“受过教育的阶层”大致包括教授、学生、大学毕业生、专业人士、作家和艺术家之类,<sup>⑥</sup>也包括“民主人士”、“第三党”组织、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等。<sup>⑦</sup>美方重视这个群体的主要原因在两份文件中表达得非常清楚。首先,这个群体受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影响最深,是美国心理战最容易得手的对象。美方评估中国知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在美国或在华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尽管很多人都信仰了共产主义,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国态度友好。<sup>⑧</sup>因此美方认为知识分子是美国心理战最容易得手的目标。<sup>⑨</sup>其次,这个群体本身很重要,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这个群体。美方认为,一直以来这个阶层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宣传的重要目标人群,共产党在赢得受教育阶层的支持方面远比国民党成功。<sup>⑩</sup>美方评估,知识阶层能够塑造民意,在国共内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的争取对象。而且美方观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为知识界在技术和管理领域提供支持,也需要其在政治领域的支持,“增加政府的‘民主’成分”。<sup>⑪</sup>加之“中共政工阶层即来源于此——受过教育的阶层”。<sup>⑫</sup>与重视受教育群体一脉相承,美方也很重视学生群体。<sup>⑬</sup>

美方关注的第二大群体是党员干部。这个群体在美国最初的对华宣传计划中尚不如“受过教育的阶层”重要,但随着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美方要诉诸影响“当政者”,从而直接和快速影响中国政治,因而把中共党员干部作为重要的宣传目标群体。<sup>⑭</sup>其实美方也知道“不可能指望改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可以“在党内鼓励民族主义和反俄倾向”。<sup>⑮</sup>总体而言,如果按照大众和精英的分野来观察,美国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主要是精英群体,即能够影响民意和政治走向的群体。

### (二)广播媒介

大致从1949年美新处撤出中国内地并在香港重新开展工作开始,一直到1953年左右,美国新闻处采用的对华宣传媒介主要是广播和邮寄印刷品。<sup>⑯</sup>对

华广播和邮寄印刷品适合美方对华宣传的目标人群——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因为,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工商业发达地区,高级党员干部也多居住在大城市,这些区域电台普及率相对较高,是美国之音广播信号可以触及的地区。美方邮寄的宣传小册子与商业杂志无疑也是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才能读懂的,因此美方邮寄的目标对象主要是中国大陆各大院校、图书馆的读者和各个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sup>①</sup>

对华广播和印刷品邮寄是迫于对华宣传形势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对于宣传部门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带来的最大变化,便是美国撤出了中国内地的外交机构,无法直接接触大陆居民,之前民国时期对华宣传的文化展览、播放电影和图书阅览室等方式统统无法再开展,因而香港美国新闻处只能采取一些有限的宣传手段,而可以触及宣传对象的两种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不受空间阻隔影响的广播和印刷品邮寄活动。

美国之音(VOA)广播是此时美国政府对华宣传最重要的媒介,在1949-1953年这段时期,其显著的特点是“节目制作香港本地化”的趋势。1949年之前,美国之音对华广播较为常见的是在美国总部录制汉语和英语节目后向中国播送,节目也多是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美国政策和反苏的内容,较少有直接针对中国局势和话题的节目。美新处的职能多是统计收听结果,重播总部的节目,很少自主创作节目和提供中国的信息。1949年之后,美国之音总部仍然制作节目并对华播送,但也出现了节目制作越来越本地化的趋势。

“本地化”首先体现在美国之音总部越来越依靠香港美新处提供的信息。香港美新处不再仅仅转播和重播美国之音总部制作的节目,也给总部提供资讯和素材。<sup>②</sup>随着时间推移,香港美新处给纽约美国之音总部提供的资讯和新闻素材越来越多,诸如关于中国内地的新闻故事和新闻分析,其中既有中国大陆发布的新闻和消息,也有内地赴港“流亡者”带来的消息。<sup>③</sup>

“本土化”最重要的体现是,美国之音开始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负责制作专门针对中国时局的广播节目。美国之音香港分部制作的节目不下十种,与中国内地宣传相关的有如下两档节目:一档节目叫做“学习”,专门针对约2000名中国内地美国之音的监听者,<sup>④</sup>采取的是大陆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会”的方式,由之前在大陆参加过政治学习活动的来港学生播讲,模仿中国共产党政治学习的语言风格。这个节目每期15分钟,内容以反共为主。美方制作者煞费苦心地策划,精心组织录制,并且尽量保证信息“准确”。“学习”是这个时期美国之音在香港制作的旗舰节目,也是美方自认为水准很高的节目。该档节目前后一共有三个语言版本,普通话是主要版本,还有汕头话版和闽南语版,针对中国内地的不同方言人群。其中有几期美方组织合唱、录制并播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歌曲,节目伴有解说词指出其中的含义及与现实的“矛盾”。<sup>⑤</sup>总的来讲,“学习”这档节目实际上是对新中国美国之音监听者的反向宣传活动。

美国之音在香港本土制作的第二档节目是“读书讨论会”,主要由一位青年人主持、四位高年级中学生和大学生播讲,针对香港美新处书籍项目所选的书籍进行讨论,并汇报读后感。该节目主要涉及两类书籍,一类是反共书籍,一类是增进了解美国政策目标的书籍,包括中美关系和中美友谊等内容,节目每期15分钟,每周给纽约美国之音总部提供一期。之前这个节目主要针对东南亚华人华侨青年,后来也向中国内地播送。<sup>⑥</sup>

为了扩大播音覆盖区域,美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除香港之外,美国之音还通过马尼拉的广播站向中国北部和东北地区播音,主要是转播美国之音节目,每天2小时,<sup>⑦</sup>还要应对苏联对美国之音信号的干扰。<sup>⑧</sup>香港美新处还建议在冲绳建广播站,便于向中国北部和中部播音(后于1953年建成),而且还提请国务院考虑向香港和大陆出售低价收音机,以便提高播音收听率。<sup>⑨</sup>如此一来,加上香港美新处对华南地区的播音,中国的东北、华北、中部、华南和华东

都有美国之音的近距离站点覆盖。

据香港美新处统计,这个阶段关于中国内地对美国之音的收听情况,总的趋势是内地和香港收听者越来越多,<sup>③</sup>滞留在华的传教士也反映收到了美国之音信号。<sup>④</sup>到1952年,一小部分回到美国的传教士反馈称美国之音传遍中国,另有人说京、津、沪、穗,以及青岛等大城市和工商业发达地区都能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也有收听的。还有人反映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美国广播吸引了更多前资本家阶层收听。<sup>⑤</sup>但限于条件,总体而言,内地收听者数量有限。<sup>⑥</sup>

从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到1960年左右,美国之音广播大抵确定以下规模:一周21小时粤语播音、30小时30分钟普通话播音、7小时闽南语播音和43小时45分钟英语播音。<sup>⑦</sup>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中国广播公司”转播美国之音的节目向大陆播送,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向中国大陆转播美国之音的节目。<sup>⑧</sup>

1953年之后,由于广播较难渗透进中国大陆,加之美国找到了宣传的新重点——向中国周边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中国话题,对华的广播媒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sup>⑨</sup>1953年之后美国之音在香港的本地化节目制作仍在持续,美国之音总部依然较为依赖香港美新处的帮助,但专门针对中国内地听众的节目急剧缩减,美国之音对华宣传的重心已经不再是中国内地居民。这一时期香港美新处继续为美国之音总部提供本土制作的广播节目,一档是之前的“学习”,一档是著名足球明星李惠堂主持的体育节目,提供给纽约美国之音总部,再播送给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居民收听。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两档节目都在1957年被取消了。<sup>⑩</sup>实际上从1950年代中期以后到1960年代,香港美国新闻处辅助美国之音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关于内地的信息、制作关于内地的节目,以及提供汉语人才方面的帮助,这些都是服务于对华侨宣传或者世界舆论的,直接针对内地居民的广播节目几乎不存在了。<sup>⑪</sup>顺理成章的是,1960年美国之音的预算只有1%拨给针对中国大陆的广播。<sup>⑫</sup>

与美方不再重视对华广播的趋势相一致,1953年之后中国大陆居民收听美国广播的状况也不甚“理想”。美国“总统海外信息宣传委员会”1960年的报告指出,中国大陆收听美国广播的人数少则几万、几十万,多则有350万台电台作为潜在收听对象,遇到有重大国际事件之时收听人数会增加。除了确定中国的美国之音监听工作者肯定能收听到之外,实际上美方也无法确切估计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在收听。<sup>⑬</sup>“美国之音”每周有100个小时左右的播音,其中中文播音只有不到60小时,普通话播音平均每天为4个多小时,考虑到当时中国的收音机普及率和受干扰情况,以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美国之音在中国大陆的收听规模和成效事实上都是有限的。

1953年以后,美国宣传重点不再是中国大陆本身,而是转向东南亚华侨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受众,后来扩展到中东、拉美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中国之外宣传中国的话题和新闻。美国直接针对中国大陆居民的广播宣传活动逐渐萎缩。<sup>⑭</sup>

## 二、美国涉华宣传的目标人群和外文新闻的运用

以上广播媒介的状况反映出美国对华宣传逐渐空心化,以及重点转向中国周边和东亚以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涉华宣传的演变轨迹。1950年代中期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在远东的宣传部门启动的“报导中国项目”(China Reporting Program, CRP)是其标志。这种“涉华”宣传路径比起上一个阶段的对华宣传路径,有了三个变化:第一是针对的对象,从中国大陆变为中国周边、亚洲地区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第二是宣传语言,从中文转向运用多种语言宣传材料;第三是宣传媒介,从主要以广播为主转向主要以文字出版物为主。总之,美国宣传战重点从针对新中国居民的宣传渗透,转为向外国舆论宣传关于中国的话题。

### (一)宣传机构和目标人群

“报导中国项目”仍主要由香港美新处负责。这与香港的传媒资源密不可分:香港不仅是获得关于中国内地信息的最佳来源地,也是传播内地消息的

传媒中心。美方评估认为,美国驻港机构可以通过内地赴港流亡者获取信息,便利地获得内地出版物,也可以从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那里获取信息,<sup>③</sup>还可以从香港本地的媒体和个人那里得到消息。<sup>④</sup>而且香港专业媒体人聚集,中外文翻译人才众多,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sup>⑤</sup>“香港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快和最可靠的中共消息来源”。<sup>⑥</sup>

香港美新处及其“上级单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对涉华消息的搜集和加工非常“到位”和及时。领馆官员每天更新关于新中国的消息,据称“仅仅领事馆就有144个人负责收集、分析并报告中共信息”。<sup>⑦</sup>香港美新处下属的机构也负责搜集信息,监控和收集中国内地的各种媒介,尤其是出版物。<sup>⑧</sup>“报导中国项目”宣传针对的目标人群主要是“精英听众”,“目标听众具备大学以上阅读水平”,主要是“政府官员、教师学生、编辑记者和政治题材作家”。<sup>⑨</sup>选择这些人群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等高阶层人士可以影响或决定政府政策,他们的态度可以决定国家的内部模式(domestic pattern)和对外观念”。<sup>⑩</sup>及至后来,报导中国项目开始兼顾大众受众,但仍以精英群体为主。美方特别强调要重点关注对政治话题和国际政治感兴趣的人群。<sup>⑪</sup>

美方涉华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外国精英,针对这个目标人群的特点,美方还特别提到了宣传的技巧和考量:要着眼于长远宣传效果,要采取新闻事实式的宣传形式,要隐蔽美国消息来源。<sup>⑫</sup>换言之,美方期待自己的宣传品能够呈现出新闻的客观性特征、有深度、覆盖对政治感兴趣人群,同时隐蔽美国的政治意图。这种宣传定位决定了香港美新处的中国报道项目采取的媒介是非常独特的:时新的新闻消息,深度的、说理性强的新闻评论(政论刊物)和原创“高端”反共题材的书籍。

## (二)时政新闻和《中国报道服务》

报导中国项目的首要职能是发布新闻,向他国媒体和驻其他国家的美国新闻处站点发布涉华新闻。最初,报导中国项目只是发布一些零散的新闻和新闻背景,“从1959年6月到12月,共有31篇新闻

专论文章和背景介绍(backgrounders)发布”。这些材料美方准备得很细致,有针对不同地区的各种版本,比如“东南亚版本、拉美版本和非洲版本”。后来这些新闻被汇编成《中国报道》(*China Report*),由短文章构成,发布给美国新闻总署,被散发到亚非拉54个国家的美国新闻处传播。<sup>⑬</sup>《中国报道》一共出版过9期,所刊文章被香港、缅甸、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媒体广泛转载,香港美新处评估其很成功。<sup>⑭</sup>

从1961年年底开始,《中国报道》升级为《中国报道服务》(*China Report Service, CRS*)。一方面,关于中国的材料获取不易,因为1960年之后中国禁止一些国内报纸(主要是省报)和杂志面向国外发行,<sup>⑮</sup>另一方面,全球媒体在1961年以后越来越关注新中国事态发展。由于以上两种形势造成的巨大新闻缺口,香港美新处决定升级新闻消息发布这项职能,出版《中国报道服务》。《中国报道服务》每月1期,发布关于新中国的事实、数据和新闻故事,给各个官私媒体提供消息来源。该刊物第一期是中国和苏联关于阿尔巴尼亚事务的论战,第二期是“反驳北京在欠发达世界”的宣传,指责新中国“散发的小册子”是“自夸和煽动”。这两期发布给了119个美新处站点和161名个人(其中大部分是记者)。据称,拉美国家和缅甸对这两期刊物反馈“良好”。<sup>⑯</sup>《中国报道服务》旨在反共,“但要避免表现得激烈和富有攻击性”。<sup>⑰</sup>而且该刊物的发行非常隐蔽,隐去了美国官方媒体的背景。美新处评估因为外国媒体一般不能也不愿意发表美国新闻处(USIS)带有明显反共宣传色彩的新闻,所以需要隐蔽信息来源(美国政府),让外国媒体认为消息来源于专业性新闻报道类刊物——《中国报道服务》。<sup>⑱</sup>

到了1964年,《中国报道服务》已发展得比较完备,包含新闻文章、特写、评论和图片几方面内容,以英、法、西、葡、中五种文字发表。<sup>⑲</sup>据美方自己的描述,因为要应对新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宣传,所以“在《中国报道项目》之下设置‘亚非新闻’专栏”。<sup>⑳</sup>而且香港美新处还在1965年试行几期之后,于1966年正式推出《亚非新闻》月报,这是一份时事通讯,计划有

斯瓦希里语和阿拉伯语两种版本,美方也在考虑针对拉丁美洲听众的西班牙语版本。<sup>⑤</sup>这样,“报导中国项目”就有了《中国报道服务》和《亚非新闻》两种新闻报刊。到了1967年,《亚非新闻》刊期较为固定,每月出版一次,每期4页篇幅,主要内容是“指摘”新中国对亚非政策存在的“问题”。<sup>⑥</sup>到1960年代末,《中国报道服务》被散发给102个国家的约2500个用户。<sup>⑦</sup>

新闻服务还有一项“保留节目”,即为美国之音提供关于中国大陆的话题。但总体上“报导中国项目”主要采用文字媒介,广播节目规模不大。“报导中国项目”会制作5~10分钟的英文短节目,发送给美国之音总部并向全世界播送。<sup>⑧</sup>该项目在1959年制作了43个节目,内容包括中国大陆情况、美国在港的社会和慈善活动、流亡者访谈等内容。<sup>⑨</sup>到1962年节目制作的数量急剧缩减,仅为两个。<sup>⑩</sup>“报导中国项目”还“每周直接给美国之音发送关于中共的最新消息”。<sup>⑪</sup>除制作节目和提供信息之外,香港美新处也给美国之音提供汉语翻译服务。<sup>⑫</sup>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报导中国项目”的广播活动重新活跃起来,美新处为美国之音等提供广播稿,<sup>⑬</sup>“制作关于中共的广播节目和其他视频材料”,“为美国新闻署各个媒介和美国之音制作关于中共的特别报道”。<sup>⑭</sup>

“报导中国项目”除了自身编辑新闻刊物之外,还为其他美新处站点做新闻剪报(clipping service),一是给很多站点发送新华社的新闻和其他来自新中国媒体的消息;二是摘编非共产党国家关于新中国的消息并寄送给其他站点,<sup>⑮</sup>同时发布关于新中国外宣旗舰刊物《人民画报》的简报。<sup>⑯</sup>

### 三、美国涉华宣传中对外文书刊的运用及项目整体效果

涉华宣传的“报道中国项目”除发布涉华新闻之外,也编辑出版深度新闻评论刊物,并主持翻译和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宣传书籍,运筹和组织编写原创性外文书刊是美方涉华宣传的一大特色。

#### (一)深度新闻评论和《当前实况》

报导中国项目不仅仅提供新闻,而且也做一些

深度新闻评论,该项目在1962年出版了一份前后贯穿1960年代的代表性刊物——《当前实况》(Current Scene)。按照美新处自己的说法,该刊甚至有一些学术研究色彩:“《当前实况》的定位有些独特,介于学术期刊和针对受教育人群的新闻评论之间。”<sup>⑰</sup>笔者认为这是一份带有学术色彩的政论刊物。香港美新处明确表示《当前实况》针对精英人群,最初为两周一期,后来发展到每个月2~3期,<sup>⑱</sup>属于“刊载关于中共信息的高层次期刊”,<sup>⑲</sup>刊物主要发行对象是所谓的“精英”,<sup>⑳</sup>包括“学者、大学教授、记者和编辑等”,这些独立用户能达到约800人,最多时向66个美国驻各国新闻处发送。《当前实况》发行较多时每期可以达到1100多本,<sup>㉑</sup>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之时,该刊物订户数量更是飙升,无需宣传就有很多用户订阅和关注。<sup>㉒</sup>《当前实况》在1966年之前有英语和日语版,此后增加了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成为多语种刊物。<sup>㉓</sup>

《当前实况》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大陆时事,介绍工农业发展情况、内地赴港流亡者的访谈,以及关于中国形势的新书介绍等;第二部分是时事评论,主要是深度新闻评论和带有学术色彩的分析文章,这部分内容超过刊物的一半篇幅。文章来源是美新处的研究部门撰写的关于新中国宣传和对外文化活动的研究报告,<sup>㉔</sup>“报导中国项目”的工作内容除了制作涉华宣传材料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情报搜集和分析。香港美新处是美国宣传机构,收集和情报也主要是关于中国大陆的宣传和文化外交方面的内容。<sup>㉕</sup>一些代表性的、具有“学术性质”的研究报告题目如下:《人民公社中的生活》《中共的文化交流》《海外华人学生在中共受教育的情况》<sup>㉖</sup>《1958年中共的教育发展》《中共反日宣传运动》《评论中共电影〈风筝〉》<sup>㉗</sup>《中共接受外国访客》《少年先锋队》《中国拉美文化交流》《中共在柬埔寨宣传的几个方面》。<sup>㉘</sup>作为一份深度评论杂志,《当前实况》每期有四分之一篇幅都是上述这类关于新中国宣传和外交的研究报告,诸如《中共的文化交流》<sup>㉙</sup>和“中苏论战”等。<sup>㉚</sup>

通过考察美国新闻署和香港美新处关于中苏分歧的系列研究报告,可以进一步发现《当前实况》独特的办刊品位和风格。关于中苏论战的系列报告主要来自苏联共产党的《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红旗》两份刊物的往还争论,罗列了从1958年4月到1960年4月这段时间内中苏论战的时间表,指出论战的主要话题是苏共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指责苏共是修正主义。几份报告甚至还详细罗列了中苏争议的若干重要议题:与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是否应该坚持和平共处、对裁军问题的态度、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力度、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族政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阵线问题等等。报告列出关于这些议题中苏两党党媒各自的表述,进而进行分析和解读。<sup>⑥</sup>这些报告被改编之后登载在《当前实况》上,很典型地体现了该刊是带有学术色彩的深度政论期刊。这些报告主要来源于俄文和中文两党党报,是鲜活的“一手材料”,而且信息量极大,属于外界不容易获取的“独家新闻”。这些“敏感话题”对当代中国读者来说耳熟能详,但是对于当时西方和第三世界对新中国政治、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关系感兴趣的读者而言,这些信息能够满足其对政治的猎奇心理。而且大多数文章是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展现出来的,平铺直叙地交代了中苏矛盾的时间线索和议题。这一切都符合对政治感兴趣的精英群体的阅读口味。

据美方评估,《当前实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文章广泛传播。新加坡的美国新闻处反馈说,美国驻新加坡的华人事务官员和英国一些重要的殖民官员都觉得《当前实况》有价值。斯里兰卡的科伦坡美国新闻处反映说,斯里兰卡当地心理战官员们觉得这份刊物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背景材料,可以帮助他们开展心理战工作。缅甸仰光的美国新闻处也把该刊提供给当地心理宣传战刊物《开放心灵》,以及军队领导人、意见领袖和政治领袖等。<sup>⑦</sup>甚至远在欧洲的联邦德国伯恩的美国新闻处也把这份刊物散发给德国主要报纸用作背景资料使用,对方觉得很有

价值。就总体效果来说,美方认为,一是看刊物需求量如何,再者要看刊物文章的采纳率如何,而《当前实况》在这两方面表现都不错。<sup>⑧</sup>到1967年,美方评估《当前实况》“已经成为关于中共事务的值得尊敬的评论刊物”。<sup>⑨</sup>

## (二)书籍项目

“报导中国项目”中还有一个“书籍项目”,全部是原创类外文反共书籍,主要分为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书目。<sup>⑩</sup>“非虚构性书籍提供给学者,强调学理性。虚构类书籍针对大众”,<sup>⑪</sup>包括一些“人物故事和小说”。这些书籍的题材主要是反共。<sup>⑫</sup>非虚构类书籍主要有:《人民公社》《中国的商业》《中国教育》《土地改革》《中国来信》《伊玛目的故事》《中国文学》《共产主义在中国》《毛泽东治下的十年》《共产主义在中国:手册》《中国女性》《中国青年》《分道扬镳:中苏的经济分歧》《不平静的边境线:中苏的边界冲突》《中共教育文选》《中共的科学家》《政治挂帅:中共的对外贸易和援助》等。<sup>⑬</sup>

虚构类小说和故事主要有:《爱丽丝在大陆》<sup>⑭</sup>《如果冬天来临》《荻村传》《薄雾下的妇女》,以及某部林语堂的作品。当然最著名的是张爱玲的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南官博的《愤怒的江》及燕归来的《雨伞花园:红旗下的学生生活图景》。<sup>⑮</sup>

该书籍项目规模很大。“书籍项目是中国报道项目中主要的、预算最大的项目,1956年开始……(该项目)就是为了给世界提供关于中共的阅读素材。每本书67~365页不等,通常每本印刷5000册”。<sup>⑯</sup>从19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60年代末,据不完全统计,“报导中国项目”至少发行英文书籍约180种,440多万册。<sup>⑰</sup>另据台湾学者王梅香统计,“报导中国项目”之下最著名的书籍——张爱玲创作的英文小说《秧歌》以汉、日、缅、印地和印尼等20种文字出版发行,共87200册。<sup>⑱</sup>

各种证据表明这个项目有一定效果。牙买加美国新闻处反馈的情况是,他们“就是需要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调查性质的书籍,用于在当地华人中宣传,这对他们很有影响力”。<sup>⑲</sup>缅甸的美国新闻处对

于书籍项目的评论和反馈是,这些书籍在缅甸大学旁边书店的销售量超过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地传播的书籍,而且还被缅甸心理战部门、国防学院与边疆管理部门阅读和使用。<sup>⑧</sup>一些材料反映了比较受欢迎的书籍项目的站点主要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东南亚、南亚及大洋洲。《北京布鲁斯》(Peking Blues)、《睡衣的故事》和《狄村传》订单最多,阅读量最多的站点是马尼拉、科伦坡和新加坡美新处。新西兰的惠灵顿美新处订了2000份《人民公社》,用来反击当地一些报刊对人民公社的好评。<sup>⑨</sup>1961年,12万余本原创书籍被香港美新处散发到79个不同站点,主要接收站点是仰光、科伦坡、危地马拉、首尔和雅加达等美新处。<sup>⑩</sup>

香港美新处总结了书籍项目“影响销售好坏的三个因素”:中国事态发展、书籍外包装和美新处的努力。在书籍项目方面,“香港美国新闻处做了很多推广宣传工作,是美国新闻署系统的优秀代表,也得到很多正面评价”。<sup>⑪</sup>

对于书籍项目的宣传技巧,香港美新处和其他国家美新处也有总结和说明。柬埔寨的美国新闻处表示,小说化的书籍特别有用,有利于达到宣传目的。<sup>⑫</sup>小说有利于扩大受众面,“有些小说和流亡者访谈录,低层次文化的读者也可以读得懂”。美新处还总结道:“这些方法最有效:(呈现)曾经生活在大陆的人的一手记录,没有明显偏见的直接叙述,(媒体)主要援引中共自己的材料来源,用小说的方式叙述大陆生活。”<sup>⑬</sup>可以看出,比起新闻报刊,小说类书籍更多地增加了故事性(戏剧性)和个人亲历的一手观察视角,显得更加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可以说是时政评论的“低配版”或者“(纪实)文学版”。这种媒介形式的选择总体上未脱离针对喜爱政治话题的精英人士的特点,但是也兼顾了“大众”目标群体对于政治的兴趣。

### (三)涉华媒介整体宣传效果

关于“报导中国项目”新闻、杂志和书籍三种媒介的整体效果,美方自我评估认为,他们“在把中共信息带给全世界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美方用

三个设问句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我们的基础任务是什么?”回答是:“向外界报道中共发生了什么,报道中共宣传机器如何塑造有利形象”。第二,“我们有多成功?”回答是:“在红色中国内采集信息很难,(在中国大陆)只有两家外国通讯社。此外就只能靠香港了……所以香港美新处在把中共信息带给全世界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已经接触了我们的产品,通过我们的努力,很多人知道了红色中国的事实”。第三,“我们怎么做的?”回答是:“在冷战新战场——拉美和非洲,中共宣传很娴熟”,“他们(新中国)宣传自己是亚非拉世界的朋友,进行反美宣传,并宣扬自身强大,宣传红色中国代表可以效仿的发展模式。中国文化使团影响广泛”。美新处的应对是“揭露”新中国宣传信息的反面例子,“我们香港美新处给予了宣传制衡和宣传反击,赢得了许多朋友和支持者”。<sup>⑭</sup>总的来说,报导中国项目指出自身是全球报道新中国的媒体中较大的一家,促进和补充了全球官方和民间涉华媒体的传媒宣传工作。<sup>⑮</sup>

对于这种“成绩”,美国新闻处上级主管部门的评价和重视程度非常之高。美国新闻署的巡查报告对该项目有一个总体评价:“香港(美新处)报导中国项目的模式在世界传媒界有一定信誉。”报导中国项目已经成为“有信誉的、适当的传播模式和实践了,目前主要是隐蔽宣传,把无关涉密的消息传播给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欠发达国家”。<sup>⑯</sup>而且这个项目的级别和受重视程度在美国政府对外工作中也越来越高。1959年,美国驻远东宣传官员会议的总结报告表示,“一致认为香港(美新处)的‘报导中国项目’十分重要,应该强烈支持并持续加强”。<sup>⑰</sup>到196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07号文件更是明确地把香港美新处的“报导中国项目”列为国家安全层级的项目。<sup>⑱</sup>1962年1月,美国新闻署向全世界所有主要美新处站点下发了重视香港美新处“报导中国计划”的指令,提请各个站点重视使用该项目提供的宣传材料。<sup>⑲</sup>

### 结语

冷战前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针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展开大规模宣传攻势,其媒介的运用主要分为1953年之前和1953年之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针对大陆居民,运用汉语广播宣传,后一阶段主要针对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中东、非洲和拉美的第三世界国家,运用外文新闻和外文书刊进行宣传。这貌似是两种不同的宣传项目:两种宣传的主要媒介不同,针对的目标人群也是一中一外,差异明显。然而,两种宣传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是互相配合的“一套”项目。首先,两者均服务于美国对华的冷战遏制战略,一个试图影响中国内部舆论,一个试图影响中国外部舆论环境,只不过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其次,美国针对新中国的两种宣传攻势,尽管媒介选择限于传播条件不尽相同,对华宣传主要是广播和印刷品邮寄,涉华宣传是新闻和书刊,但是美方宣传的目标人群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这点惊人的一致。<sup>①</sup>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针对中外精英人士,尤其是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的目标人群,美方所制定的配套的宣传技巧颇堪玩味。首先是新闻式的宣传,美方要进行“事实输出型”的宣传,要“选取准确的,基于事实的,客观的信息”。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目标人群觉得自己是在阅读新闻,而不是接受某些特定的政治灌输。<sup>②</sup>其次是着眼长远效果和深度。美方设计的意图是“总体上着眼于长期效果”,而且由于宣传针对的是对政治感兴趣的精英人群,这种宣传自然要虑及深度。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把美方的宣传品与肤浅的娱乐传媒区分开来,让读者认为自己是在进行学理思考。第三是隐蔽性。美方要“隐蔽(信息的)美国来源”,并且“尽可能采用非美媒的观察和评论,这是增加信誉的手段”。这个设计服务于前面两个目的,隐藏政治意图和权力干涉、“洗白”宣传品的目的就是将其伪装成时政新闻、时政书刊及文学作品。<sup>③</sup>

笔者认为,美方宣传部门的这种技巧,其本质是为针对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创设一种智识讨论的氛围,并建构一种“知识场域”。美国之音的读书会、深度新闻分析和评论,以及反映社会问题的虚构和非虚构书籍,这一切都围绕着为高校师生、中学师

生、其他知识分子和关心时政的人士创设一种学术研讨的情境,以及深度思考的感觉。这个特点与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东南亚华侨宣传中关注精英群体和知识分子是一脉相承的。宣传就这样被伪装成了知识研讨和阅读体验,宣传对象认为自己是在从事高层次的知识探讨甚至是学术讨论,实际上在其背后“看不见的手”早已设定好了议程、方式和答案。美方宣传机构让“思想钢印”在宣传对象头脑中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成,被宣传对象“愿者上钩”,不知不觉沉醉于其中并接受美方的观念和思维范式。这代表了一种非常隐蔽和“高超”的宣传技巧,实际也体现了美国对全世界文化精英,尤其是向第三世界政治施加影响力的一种宣传方式。

香港美国新闻处对华涉华宣传攻势中的媒介选择和实践操作,也生动地体现了冷战与传媒之间的关联性。冷战的特征就是“冷”,两大阵营没有主要诉诸热战的方式,而是重点依靠相互威慑和相互宣传进行交锋和对抗,因而冷战本质上就是传媒战和心理战。我们从香港美新处对华涉华宣传中可以看到,美国冷战政策的执行者,不仅需要职业外交官、国际关系谈判专家和军事人员等传统涉外“工种”,也需要传媒从业者;美国冷战的部门机构不仅是传统的涉外机构(国务院)、军事机构(国防部),也有美国新闻署(处)这样的信息传播机构。这其中的原因既有冷战之“冷”的因素,长远看来,也体现了传统外交向新型外交的转变。新型外交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一国对外交往过程中如何适应20世纪以来兴起的大众传媒社会,相应的职能转变就是在“外交”中越来越多地容纳“外宣”的职能和人员。因而,不仅是冷战和传媒,国际政治和大众传媒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紧密地缠绕和结合在一起的。

#### 注释:

① 参见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研究(1949-1969)》,《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

② 参见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媒介

与受众》，《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翟韬：《冷战纸弹：美国宣传机构在香港主办中文书刊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Lu Xun(吕迅)，"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Gregg Brazinsky, *Winning the Third World: Sino-American Rivalry during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7, "Chapter 5. Cultural Competition, 1955-1964".

③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0)ending May 31, 1950, November 3, 1950,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 46g/11-350, The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t College Park, Maryland以下简称NACP, 为行文简洁, 出自同一NACP档案的文献不再列出详细信息。

④Hong Kong USIE Branch Office Report for June 1950,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45-1949, 811.20200(D), Box 4567, 511. 00/7-1946, NACP.

⑤Present Status of the Information Program in China, February 8, 1950, Record Group 59(RG 59),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E1559, Lot 52D365, Box 48, NACP.

⑥Country Paper for China, August 1950, RG 59,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D48, Box 116, NACP.

⑦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 February, 1951, RG 59,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D48, Box 115, NACP.

⑧Country Paper for China, August 1950.

⑨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 February, 1951.

⑩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 February, 1951.

⑪Country Paper for China, August 1950.

⑫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 February, 1951.

⑬Draft Plan for USIS Hong Kong, June 9, 1953,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6-953, NACP.

⑭Draft Country Plan for USIS Hong Kong, June 9, 1953. 在这个时期有三份正式的针对大陆的宣传计划, 分别为Country Paper for China, August 1950; Interim Propaganda Plan For Communist China, February, 1951; Draft Country Plan for USIS Hong Kong, June 9, 1953. 在1950年8月的第一份对华宣传计划中, 党政干部排在知识分子后面, 位列第二重要目标人群, 但是1951年的宣传计划和1953年的宣传计划则都认为党员干部在宣传上比知识分子群体更重要。

⑮Country Paper for China, August 1950.

⑯Present Status of the Information Program in China, February 8, 1950. 美方邮寄印刷品的工作主要从1949年下半年到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军队参战, 断断续续到1953年。由于影响有限, 本文对该问题不展开论述。

⑰1950年, 美方将相关印刷品邮寄给约5000所学校、图书馆、教育中心、商业企业和其他单位。这些材料甚至还直接邮寄给了包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干部。

⑱USIS-China Central Office Report for March 1950, April 20, 1950,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 93, Box 2532, 511.93/2-1550, NACP.

⑲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3)ending May 30, November 19, 1953,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8-1953, NACP.

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为了提防和监听西方国家对华广播(尤其是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组织了专门的监听者队伍, 用于了解对手动向、搜集信息及定期汇报。

㉑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 46g, Box 2575, 511. 46g/10-952, NACP; 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November 30, March 26, 1953,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46g, Box 2575, 511.46g/3-2653, NACP; 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3)ending May 30, November 19, 1953.

㉒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November 30, March 26, 1953; 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3)ending May 30, November 19, 1953.

㉓Summary Statement on USIE in Asia, March 28, 1950, RG 59,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2D365, Box 48, NACP.

②4 Country Paper for China, August 1950.

②5 Future Program of USIS in China, May 29, 1950; USIE Country Paper For China, May 19, 1950.

②6 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0)ending May 31, 1950, November 3, 1950.

②7 Effectiveness of UISE Operations in China, July 14, 1950,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Lot 53D48, Box 114, NACP.

②8 USIS Hong Kong Semi-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for the period(1952)ending May 31, October 9, 1952.

②9 Present Status of the Information Program in China, February 8, 1950.

③0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PCIAA): Communist China, May 23, 1960,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 Gale Group Inc, CK3100122359.

③1 II A(Taipei)Senmi- Annual Evaluation Report, Dec 1, 1951– May 31, 1952, July 12, 1952, RG 59, Central Decimal Files 1950–1954, 511.93, Box 2532, 511.93/7–1252, NACP.

③2 翟韬:《美国对新中国宣传政策的演变(1949–1969)》,《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③3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RG 306, Country Plans 1953–1961, Box 51, NACP.

③4 Assessment of USIS–Hong Kong Operations Since November 20, 1956, February 20, 1958;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RG 306,(Africa/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 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③5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 May 23, 1960.

③6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 Communist China, May 23, 1960.

③7 参见翟韬:《美国在第三世界涉华宣传研究(1949–1969)》,《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

③8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③9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RG 306, Country Plans FY 1960–1963, Box 117, NACP.

④0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④1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④2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Lu Xun(吕迅), "The American Cold War in Hong Kong: Intelligence and Propaganda," in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pp. 123–128; Chi–Kwa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94–195.

④3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④4 Assessment Report– USIS Hong Kong– 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④5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④6 Assessment Report– USIS Hong Kong– 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CP.

④7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ebruary 6, 1964, RG 306,(Africa/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④8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④9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⑤0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 Box 2, NACP.

⑤1 Assessment Report– USIS Hong Kong– 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⑤2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⑤3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⑤4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⑤5 Revised Section V of the Country Plan for Hong Kong, July 15, 1966, RG 306,(Africa/Europe)Country Plans, Box 2, NACP.

⑤6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5, January 12, 1966, RG 306, R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 1955–67(E 1039), Box 12, NACP.

⑤7 Revised Section V of the Country Plan for Hong Kong, July 15, 1966.

⑤8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 March 9, 1967, RG 306, Records Concerning Exhibits in Foreign Countries, 1955-67(E 1039), Box 12, NACP.

⑤9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 March 9, 1967.

⑥0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⑥1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RG 306, Records of the Inspection Staff-Inspection Reports and Related Reports, 1954-1962, Box 4, NACP.

⑥2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⑥3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⑥4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ebruary 6, 1964.

⑥5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5, January 12, 1966.

⑥6 Revised Section V of the Country Plan for Hong Kong, July 15, 1966.

⑥7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⑥8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⑥9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⑦0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⑦1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⑦2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February 6, 1964.

⑦3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⑦4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 March 9, 1967.

⑦5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5, January 12, 1966.

⑦6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⑦7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⑦8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November 3, 1959.

⑦9《风筝》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与法国加朗斯影片公司联合拍摄的奇幻儿童片,由王家乙、罗吉·比果联合执导,谢添、张春华、派·特巴尔地纳、茜·罗森堡、钱·兹曼斯基等出演,于1958年12月17日在法国上映。该片讲述了法国男孩比埃罗通过一只漂洋过海而来的风筝与中国的小朋友结下友谊的故事。

⑧0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⑧1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⑧2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⑧3 Office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 Further Elaboration", November 3, 1960, Records of U. S. Information Agency(USIA), in 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60-1975, ProQuest History Vault(HV); Office of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e Sino-Soviet Dispute And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s," November 25, 1960, Records of USIA, ProQuest HV; Research and Reference Service, "The Sino-Soviet Controversy: Key Issues and Chronology," July 25, 1961, Records of USIA, ProQuest HV.

⑧4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⑧5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⑧6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Report for Calendar Year 1966, March 9, 1967.

⑧7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⑧8 Revised Section V of the Country Plan for Hong Kong, July 15, 1966.

⑧9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⑨0 书籍名称除了单独注释的之外,来自对多个档案信息的提取,参见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⑨1 王梅香:《隐蔽权力:美援文艺体制下的台港文学(1950-1962)》,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清华大学”,2014年,第176页。

⑨2 王梅香:《隐蔽权力》,第193页。

⑨3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⑨4 这里的数据来自对于多个档案信息的提取和综合,如 USIS Hong Kong Country Plan 1962, October 4, 1962;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⑨5 王梅香:《隐蔽权力》,第231页。

⑨6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⑨7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⑨8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 ⑨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 ⑩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 ⑪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February 10, 1960.
- ⑫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 ⑬ USIS Hong Kong Assessment for 1961, January 15, 1962.
- ⑭ Assessment Report—USIS Hong Kong—Objectives I & II, January 24, 1961.
- ⑮ Inspection Report: USIS Hong Kong, April 10, 1962.
- ⑯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Far East Public Affairs Officials' Conference at Baguio, Philippines, April 27—May 1, 1959,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espatches, 1954—1965(E 1047), Box 2, NACP.
- ⑰ NSC 6007, May 9, 1960,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DRS, CK3100113632.
- ⑱ Circular Airgra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to All Principal USIS Posts(69), Washington, January 16, 196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17—1972, Volume VI, Public Diplomacy, 1961—1963, 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State, 2017.

⑲这也符合当时美国在亚洲区域宣传的目标人群设计：“重点瞄准政府、军队和教育界潜在领袖”，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军队、青年和学生领袖、劳工领袖及教师教授知识分子整体”，参见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PCIAA): Asia, July 11, 1960, CK3100159285, DDRS. 也可参见翟韬：《冷战纸弹：美国宣传机构在香港主办中文书刊研究》，《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

⑳尽管号称提供的信息是客观的事实，但美方私下里经常说这些信息是“经过挑选的材料，目的是影响和教育(目标人群)”。参见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㉑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August 27, 1959; 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 The Cold War and the Mass Medias: Target Population and Media Use in the Propaganda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 to China in the 1950s and 1960s

Zhai Tao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era of the Cold War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 S., the U. S. government launched a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offensive i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One is aimed at mainland Chinese residents, using Chinese media to "propaganda to China"; the other is to use foreign media to carry out "propaganda on China" in world public opinion. The target group of propaganda to China is mainly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nd party and government cadres of New China, and the main medium used is radio and mailing presswork; the target group of propaganda on China is foreign social elites and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in media is news and publications. In general, the target audience of American propaganda to China and on China is the educated elite class, and the choice of propaganda media is correspondingly "intellectual activities" and "knowledge experience"(broadcast reading clubs, current political news and books, and social documentary novels), and the content is mostly carried out around in-depth current political news topics. This is a common propaganda technique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to target the social elites of the third world, reflec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old War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Hong Kong(USIS—Hong Kong); propaganda; Voice of America (VOA); China Reporting Program(CRP)